

张玉兴  
著

# 明清史探索

辽海出版社



张玉兴 著

# 明清史探索



© 张玉兴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史探索 / 张玉兴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4.4

ISBN 7-80669-902-3

I. 明… II. 张…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明清时代 - 文集  
IV. 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9991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吕贤超

责任校对: 顾 季

版式设计: 江 雪

封面设计: 马寄萍

---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86520015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www.lnjybz.com](http://www.lnjybz.com)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33.25

插 页: 10

字 数: 925 千字

---

出版时间: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20.00 元



作者近影，摄于2004年元旦

张玉兴，1939年5月生，辽宁铁岭人。1958年参加工作，任中学教员。以业余形式，获得高等教育。1978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历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退休前曾任清史研究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曾被辽宁大学历史系、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被聘为浙江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全清诗》筹委会、《百衲本二十四史》重印出版工作委员会学术顾问，及《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主要论著有：编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合著《清代东北史》、专著《南明诸帝》、《清通鉴·顺治朝卷》、合作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文集述要》及《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中之《明代卷》与《清代卷》；论文《范文程归清考辨》、《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等70余篇。

## 《明清史探索》序

何龄修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兴先生，自选其明清史、满族史论文五十余篇，结集为《明清史探索》行世。

我与玉兴先生相识于改革开放之初，岁月如流，忽忽逾二十年。二十余年来，我们彼此阅读对方新作，信函、电话往来不断，经常会面，互诉近况，切磋学问。我从这些阅读和切磋中深受教益。我们之间不自觉感情弥笃，知心益深。交友之道，最重三端：人品、学问、性情。玉兴先生这三方面都使我以为难得，也承他不弃，所以我们的友谊能深入持久，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史学选集出版之际，我想谈谈对他的学术的几点理解，以表达一个好友的欣喜。

玉兴是在“极左”的逆境中崛起的。他以自学为主，辅以进修而成才。从客观环境的挫折中不隳青云之志，坚持学习、奋进，终于成功。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自立自强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1978年，玉兴正希望进修补课时，北京的一位老教授知道他的学历不足，年近

不惑，才搞研究，便叹惜说“太晚了”。老教授虽然不是有意唐突，危言耸听，但是，这种坦率流露的大实话，对热情正高的玉兴来说，不啻当头一棒。然而，这种经验之谈只能击溃常人，他们经受不住，就消沉了，放弃了。玉兴则把打击变成动力，表现出坚强的毅力、自信和对成功的渴望。二十余年来，他做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卧薪尝胆，焚膏继晷，铢积寸累，遂成丈匹。我知道他纂注清代东北流人诗时，奔波于京沪江浙皖粤，挖掘那些分散、深藏而稀见的材料，结果编成一本新鲜、有特点、富于学术价值的清诗选集。此书的著作过程，反映出他付出劳动的艰辛，但他在书的《前言》中一字未及，视为固然。我一直把这些努力放在眼里，自愧不如，深知自立自强是支撑玉兴学术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成才的途径，影响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治学的方法、方向。自学成才的学问家治史，往往因在自学的过程中长时间钻研史籍，日益深入，很自然地擅长乃至迷恋考据。考据是探明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手段，是重要的史学方法之一。玉兴成才之路恰恰是从考据开始的。玉兴有不少一流的考证文章，八旗制度相关问题辨析，范文程归清，李延庚叛清，努尔哈赤军师龚正陆（六）、重臣阿敦事迹，纳林布禄、岳托、苗君稷等析论，皇太极留养张春，多尔袞拥立顺治，郑芝龙、陈梦雷等史事，等等，经过他缜密考证，扫除翳障，冲决迷阵，便皎如白日，显露真面。这些大都是入关前满族崛起过程中的史事，称为清前史。玉兴对清前史史实的探索是很深的。清前史史料严重缺乏，抉奥发微，较之探索清入关后史事，其难十倍。而且考据虽具体而微，所关系者则甚大，如范文程归清，其意义实在于说明满族兴起时汉族士人境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对待汉族士人政策异同，以及汉族士人在清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其他诸文都关乎当时政治、军事，不是茶余饭后谈资，漫然命笔之作。这些文章是玉兴史学成就中最有心得的部分，是其著述中的上乘之作。就对清前史的发  
明、发现而论，论文作者张玉兴先生，在孟森、王鍾翰等前辈先生以后，至今罕有能与比肩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章完全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考据的精品。这表现出玉兴自学成才的本色，反映出他读书细致，看问题透彻，解决问题深得史学考据三昧。卓越的考证，清前史研究的诸多重要创获，代表了玉兴学术的突出特色。

玉兴不只是考证做得好，而且其治史视野广阔，思辨深刻，说理透辟，议论劲健。他的长篇论战文章，充分展现这方面的长处。关于九义士、三学士和其他一些论文中许多议论、分析，都写得淋漓酣畅，情理昭然。他通过努力，具备了比较全面的史学修养，打破了自学成才者短于议论，不善于提炼、概括并升华为理论的“常规”。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玉兴的论析中充满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共同心理、思想、意识，奋进的力量、高尚的品格、忠诚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当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当民族奴役、民族征服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浴血抵抗还是屈膝投降，永远是关于民族精神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操觚作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则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评述前人的这类活动，把史学的真实性、真理性放在首位，不为任何经济的诱惑、政治的胁迫，名利的吸引所屈服，而歪曲历史，歪曲史学。这是董狐以来树立的可贵的史学传统。但做到这一点一直是不容易的。明人冯时可批评说：“今之操觚者，求惊人不求服人，求媚世而不求维世，此海内所以无文宗也。”<sup>①</sup>这是明朝人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观念的混乱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突出的是混淆古今，不顾一切以时间、空间、条件为转移的基本要求，忘记地方和时代是历史必不可缺的要素，史事绝对受它们限制，而使历史无落脚处。用混淆古今的方法，否定古人保障国家民族利益的殊死斗争，必然斩断中国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仿佛我们的祖先只热衷家务纠纷、萧墙设斗，从不关注民族存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只是到了抗倭驱荷以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才有了民族英雄。这完全

---

① 冯时可：《冯元成选集》卷六七，《谈艺录》。

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近来还听说有人推出一种“模糊史学”，主张对历史上一些特定的民族斗争做模棱两可、稀里糊涂的论断。玉兴没有忘记一个史学家的神圣责任，他用自己切实的研究成果，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我们祖先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传统，维护了历史科学的纯洁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他的论著处处表现出历史主义科学精神、鲜明的是非观念，读后使人明确应该敬仰什么、鄙弃什么。他的几篇论述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专论，与流行的错误展开辩论，心平气和，说理透辟。这些犀利的论文，也是玉兴史学成就中富有心得的部分。明人钟惺说：“作史之义，昭往训来，美恶具列，不劝不惩，不之述也。”<sup>①</sup>不分青红，颠倒黑白的“历史”文章就不能要。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历史，才能正确学习和借鉴历史，真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因此，出色的分析议论，明确的理性判断，昂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玉兴学术的突出特色。

现在谈谈我所理解的玉兴在史学实践中的创新。创新，人人能言之，但真正创新之作总是凤毛麟角。有些著作，很少发明，许多内容真如汉文景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读后令人失望。这不奇怪。创新是学人德才学识综合的自然的体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是浅学平庸、急功近利可以获得的。“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sup>②</sup>玉兴深谙为学之道，自跨进学术之门，就紧紧把握住德行与学识的关键，在实践中确定以“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为指针<sup>③</sup>，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取得丰硕的成果。学术的创新，表现在新课题新领域、新研究方法、新资料、新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玉兴的史学创新

① 顾充：《捷录大成》，钟惺：《原序》。

② 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卷上，引王芑孙复龚自珍书。

③ 张玉兴：《严格自律 严谨治学》，载《科研成功之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也是多方面的。我只谈他的新研究成果。他的论著惟陈言之务去，每一项成果、每一篇文章都是他长期劳动的结晶，没有一项一篇没有他独特的心得，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突破。他的考证文章涉及的主旨人物的研究，都是从他开始的，是新课题新成果。那些有过成果的课题，他也都有创获。例如关于多尔衮拥立顺治课题，他不仅完整地栩栩如生地复原了诸王贝勒大臣继位定策会议的全过程，以确凿史料为依据所作豪格逊让及继统失败原因等细节的分析，非常符合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当时的制度、环境，而且他最具总结性的论断，说这次拥立顺治帝是“多尔衮巧妙的夺权”<sup>①</sup>，反映他对整个课题、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质最简明、准确、深刻、新颖的认识。全文不长，但读来耳目一新，没有多年潜心研究，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明清史探索》其他诸文几乎都具此功力，经得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检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是学术的常规，是学术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玉兴的著作在史学之林中，其创新如此突出，这就不能不构成重要的特色。

一篇简短的序言，不能尽情发挥玉兴学术的精华，只能就我的理解，拣重要的说说。我个人学识陋劣，所说未必就包括了其最主要之点。玉兴虽年过花甲，但是体魄壮健，精力旺盛，其科学创造力至少还可保持二十年不衰。如何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就老年人说是个战略问题。读者可以期待更上层楼的《明清史探索续集》和其他著作问世。是为序。

2003年12月10日于五库斋

---

<sup>①</sup> 张玉兴：《多尔衮拥立福临考实》，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 言尽于有征，语绝乎无验

——序《明清史探索》

武 斌

---

在我看来，张玉兴先生的自选论文集《明清史探索》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我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青年时期求学及中学任教阶段不算，张玉兴先生以职业学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么多的年头里，他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明清史”这一领域，筚路蓝缕，辛勤耕作，其中所作最多的是明清之际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历史规律的研究与探讨。这部文集的出版，是玉兴先生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研究成就的基本面貌，也可以从中一窥他所了解、复原和描绘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原

貌。

明清鼎革之际，亦即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最为复杂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代。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时期的变革，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也为后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研究和思考的空间。其中的历史真相、历史故事和历史经验，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带有历史趋势和规律性的东西，都特别值得去挖掘、去探索、去研究。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集中了当今历史学界一部分最优秀的专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玉兴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那段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出版了多部有关的研究著作，比如《南明诸帝》、《清通鉴·顺治卷》、《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及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中的《明代卷》与《清代卷》等的编纂笺注，以及其他有关明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的论文。从这部文集所集结的文章来看，玉兴先生对明清之际的研究，涉及典章制度、政策战略、文化诗文、人物行踪、重大事件、抗清活动等等许多方面，并多有新见。比如清代开国宰辅范文程，以往都认为他是主动投奔努尔哈赤，受到礼遇重用。玉兴先生在《范文程归清考辨》的论文中，经过缜密考证，不袭成说，指出范文程乃是在努尔哈赤时被俘为奴，备受屈辱而九死一生者，直到皇太极时代考试儒生，才得以出头，逐步受到重用。这篇论文在清史学界备受关注，受到充分肯定。此外，在有关后金重要将领李延庚叛清、皇太极留养张春、多尔衮拥立顺治、明末“九义士”和朝鲜“三学士”，以及清开国时期谋臣之遭遇、清开国史上诸多谜案、疑案，如此等等，玉兴先生对浩繁的史料缜密考证，细致梳理，披沙淘金，发前人所未发，纠史之谬，证史之疑，成就斐然。

张玉兴先生的文风，质朴无华，无浪漫色彩的铺陈和漫无边际的

述说，没有主观的想象和虚应故事，而是把历史的描述置于清冷的签注和钩沉之中。所以读玉兴先生的文章，总有一种无形之中的“张力”，“迫使”你去面对一个个由他徐徐道来的、层层剥笋的历史事实。尽管你急着要看到他的结论，但同时又不得不为他所叙述的人物故事所吸引。也许这一点正是他的治学风格和治学态度的表现。他坚持用“事实”说话，言尽于有征，语绝乎无验。这是他作为史学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从而使人在他的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朴学遗风。玉兴先生长于考证，而这些考证功夫却是他扎实的态度和辛勤的劳动的结果。在编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时，他从数百种方志、笔记、诗文中辑佚钩沉，其中包括从近万首流人诗作中，通过认真思索、寻绎，发掘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而后著而成书。前文提到的《范文程归清考辨》，则是他运用稀见的原始档案，比勘了有关其人的所有传记，详细分析了最原始的传文，特别是利用了他人尚未用过的笔记《客舍偶闻》一书。有了这样扎实的材料和校勘功夫，才敢于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当代文学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传统的观念都认为论不是学问，史才是学问，中外皆然。”我理解王先生这话的意思，主要在于强调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考据功夫，亦即强调史学“用事实说话”的实证传统。我对王先生的这句话深以为然，并在多处引述过，因为我常常检讨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和心得，总觉得“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应该是做学问的一大境界。我原本是读哲学的，拙于实证研究，近些年迈入到史学的研究领域，研读中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史，在与史学界师长的请益和交流中，在读中外史学的论著中，我常常感受到这方面的启发和教益。我以为，思想尽可以自由地驰骋，想象尽可以漫无边界，而对于历史的研究和判断，首先要求的是对于历史“事实”的敬畏和尊重。当我们在讲述、评论历史的时候，心中首先涌起的就是这种敬畏之情。而思想和想象，只有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才会有思想的价值和想象的力量。

## 二

美国当代思想家唐纳德·R·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历史是一种探寻形式”。这个观念来自于希罗多德和柯林武德：“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既然是“探询”，并且是“无休止的探询”，那么，历史学家们呈现出来的“历史”就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不同历史学家“探询”、“解释”和“叙述”的成果。尽管史学主张“用事实说话”，但对历史“事实”的“探询”、“解释”和“叙述”因人而异，因而历史就是“多面”的，是“多面的历史”。

以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为例，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描写，就经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的事件从来都是“现在的”，我们用“现在时”去说、去写、去听、去读。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就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提出了许多新鲜的想法和论述。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或对于历史的总结，都是一个有益的和可喜的事情，并且也有利于思想和学术的进步。我历来以为，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如何尖锐，如何交锋，都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不同的、批评的意见，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意见，都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价值。我们已经早就走出了“一言堂”的和设置学术禁区的时代，自由的表达是每个学者的基本权力。

但是，这并不是说，自由的表达不需要批评。比如，在对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各种“探询”和“解释”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倾向。比较典型的是：因为清朝政权后来成为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一些学者遂将明清交战，乃至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一概视为国家统一战争，进而提出洪承畴等降清人物是认清大势为清初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辨别历史是非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也反映了论者的历史观念和歷史态度。对于这种看法，张玉兴先生旗帜鲜明地提

出了反对意见。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主张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来分析。他在《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的《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明清之际，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坚持抗清斗争的忠义人士和投清叛明的贰臣这两大群体，其中都不乏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两类人物的评判，确实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而鞭笞叛逆、表彰忠义，则是张玉兴先生治明清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和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一样坚持认为，当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当民族奴役、民族征服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态度，是浴血奋战还是屈膝投降，永远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玉兴先生认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历史学家应该明确研究历史、描述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全在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传统美德，以褒善贬恶，益人心志，振奋民族精神。在他发表的论著中，强调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正气是其重心所在。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中，着重展示的是许多清代东北流人文士，困不辱志，以可贵的努力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在《南明诸帝》中，既揭示了南明诸帝苦苦挣扎终归失败的历史原因，更着重叙写了集合在其抗清大旗之下的大批英烈人物的悲壮历程。在有关张春、李延庚、函可、苗君稷、陈梦雷等人以及明末“九义士”、朝鲜“三学士”的研究论文中，都鲜明地坚持和伸张表彰忠义的思想。特别是在长达几万字的论文《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中，张玉兴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鲜明地提出，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讨论，事关重大的理论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

德价值导向，绝不可含糊和漠然置之。他在论文中详细揭示了明清之际的忠义之士和叛明降清的贰臣这两大人群的各种具体的情况和各自的表现，进而明确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羞辱大恶。“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温习历史，查阅明清之际忠贰人物的一桩桩往事，更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深深体会爱国这一伟大主题的社会深刻内涵，深深领会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部分的精神实质，将给人们不尽的思考。”

鞭笞叛逆、表彰忠义，这是张玉兴先生治史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仅是他的历史观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和治学品德。关于史家的素质和修养，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章学诚补充“史德”。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又提出“史心”。钱穆认为，史家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具有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心情。此“史心”，一是指治史者要具有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劳的心情，即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他说治史者当以“世运兴衰”、“人物奸贤”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治史学，要有一种史学家之心情，与史学家之抱负。若不关心国家民族，不关心大群人长时期演变，如此来学历史……最多只能谈掌故，说旧事，更无史学精神可言。”二是指治史者对待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心志。他认为，治史者首先应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胸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能开口就骂，做全盘的自我否定。他在《史学导言》的讲演中说：“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广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是眼前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历史责任，才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的对象。如此这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

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

论“世运兴衰”，辨“人物奸贤”，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家的治史理念，也是一切历史学家们的价值理想。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说：“我以为这是叙述历史的首要任务：不让任何理应表彰的事迹湮没无闻，并使后世的责难作为一种威慑对邪恶的言行有所制约。”近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也指出：“重要和真正的史著能给予人教诲，并通过提供以往行为的知识使人能在当下举止慎重，能对未来深谋远虑。”治史的目的在于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导现在的人们，在历史中寻找激发创造今天生活的智慧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玉兴先生“鞭笞叛逆、表彰忠义”治史的主题，正是中外史家们一贯倡导的价值理想的表现，是钱穆先生所谓“史心”的表现。而在这价值理想、这“史心”的背后，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无尽眷恋和对自己国家的无限热爱的热烈情怀，以及这种深厚情感所养成的“一番广大的心胸”、“一番广大的眼光”。

### 三

自古以来，“文章憎命达”。张玉兴先生的“史识”、“史心”以及他的心胸和眼光、他的热烈情怀和宏富的学问，却都是在艰苦的生活磨炼中锻造出来的。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情况相似，他走上学问之路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努力过程。玉兴先生青年时代就有志于学，但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原因，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不得不走上了更为艰辛的自学之路。自学成才，古往今来不乏大成就者，但是，对于自学者个人来说，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的“正途”之外，不能不是一个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并且，迫使他们去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玉兴先生正是在这些苦难的磨炼之下，锻造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在走过那些艰难的治学之路上，始终支持他的、支撑他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



冯友兰先生很喜欢的宋儒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在引述张载的这句话后接着说：“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继绝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致，心向往之。”可以说，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是深得其味。中国知识分子向有以文载道的传统，他们做学问并非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心中有着自己和前辈们共有的文化信念和文化使命。“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反复吟咏的根本问题。他们在学问之上，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更关心现实的社会生活。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所以中国的学术具有鲜明的入世的特征。经世致用，齐家治国，继往开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观。这是一种极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是一种包容天地、慷慨恢宏的人生观。中国的读书人担当起传承民族传统、维护礼治秩序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自觉的承担。他们抱定了“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责任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愈挫愈奋，坚忍不拔，明责敬业。而在学术和文化没有得到社会正当评价的时候从事这样的事业，在屡经磨难和挫折仍然坚持这样的事业，如张玉兴者以及许许多多现代中国的学者们，更需要道德的力量。这正是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境界。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或由于时世艰难，或由于人心险恶，致使许许多多的读书人并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他们空有满腹经纶而不为人所识，他们被人误解和排斥，他们苦于没有进言的途径和活动的舞台，流落江湖，退隐山林。他们的才智被湮没在历史的烟霞中。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和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张玉兴先生是一位传统类型的学者，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学问之道和治学理念，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做事为人，体现在他生活态度中。我与玉兴先生同事多年，近些年来又毗邻而居，时常就一些历史问题